

豫西南维吾尔族聚居区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调查研究

刘丹

(郑州大学, 河南省、郑州市, 450001)

摘要: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工作。本文以河南南阳石佛寺镇维吾尔族流动聚居社区为研究对象, 采用问卷、访谈、实地观察等方法调研当地语言生态与语言政策实施现状。研究发现, 石镇存在维汉双语沟通失衡、普通话培训应试化且实用性不足、语言规划长效机制缺失等结构性困境, 并结合言语社区理论、稀缺理论剖析问题成因。依托语言规划三重理念, 本文从宏观政府社区治理、中观家庭代际语言培育、微观个体自主学习三个维度, 搭建立体化优化路径, 丰富内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语言规划研究案例, 提出贴合玉石产业特色的语言服务方案。

关键词: 语言政策; 语言规划; 国家通用语言; 维吾尔族流动人口; 石佛寺镇

中图分类号: H1

文献标识码: A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 “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推进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实施, 催生了具有时代特征的人口双向流动现象。在大量内地专业技术人才持续向新疆等西部地区迁移参与边疆建设的同时, 以新疆维吾尔族为代表的西部少数民族群体也呈现规模性“东进”态势,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人口迁移新图景。这一背景下, 豫西南地区的南阳市镇平县石佛寺镇(以下简称“石镇”)作为全国最大的玉器生产加工集散地, 依托特色产业优势吸引了包括新疆维吾尔族商人在内的多民族群体聚居。

据调查, 石镇已汇聚来自 16 个省(市、自治区)的工商业者及游客, 涉及维吾尔族、回族、蒙古族等 9 个少数民族群体。该区域日均人流量可达 15-16 万人次, 呈现典型的高流动性、多民族性特征。这种特殊的人口构成使石镇演变为多元语言文化交汇的“社会语言学实验室”: 普通话、中原官话、镇平方言、维吾尔语及各少数民族语言在此交织碰撞, 既构成独特的语言生态, 也衍生出复杂的语言交际障碍。特别是作为当地最大少数民族群体的新疆维吾尔族居民, 其语言使用与地方社会融入问题已成为影响区域民族关系、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宏观背景下, 如何科学构建国家通用语言与民族语言和谐共生的语言生态, 有效促进跨民族语言沟通与社会整合, 已成为关乎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社会稳定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课题。

一、引言

豫西南南阳市镇平县石佛寺镇(简称“石镇”)作为全国最大玉器生产加工集散地, 吸引多民族群体聚居, 形成高流动性、多民族的多元语言生态, 普通话、维吾尔语等语言交织碰撞, 维吾尔族居民的语言使用与社会融入问题成为影响区域民族关系和发展的关键。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2002)较早描述了新疆地区民族语言的分布状况和发展趋势, 让我们对新疆地区维吾尔语的语言状况有了整体的了解。王洋(2007), 王莉、崔凤霞(2009)探讨了新疆维吾尔族的语言态度、对汉语的认同感以及语言观等问题。张伟(1987), 杨德明、付东明(2009)以及阿里·阿里木江(2014)等从各个视角考察了新疆维吾尔族聚居区双语教育的开展状况。孟红莉(2013)对新疆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语言生活状况进行了深入调查。王莉、连吉娥(2015)指出维吾尔语在聚居区居于绝对优势地位, 并提出一系列推进聚居区语言生活发展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现有研究多聚焦新疆本地维吾尔族语言状况、语言态度及双语教育，针对内地维吾尔族聚居社区的语言生态与政策实践研究仍有不足。本研究以石镇维吾尔族聚居社区为对象，结合问卷调查、访谈、非介入观察及录音转写等方法，探究其语言生态深层矛盾与结构性困境，兼具学术理论价值与社会现实意义。

二、语言政策实施过程中的问题

尽管石镇语言政策在促进多民族交流融合、推动区域经济协作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但受多重因素影响，石镇语言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也有许多问题，制约着石镇语言生态的发展。以下是石镇语言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一）双语交流障碍性与均衡性问题

通过实地调研发现，成年维吾尔族居民的普通话应用能力呈现出显著的结构特征。调查显示，石镇维吾尔族居民普通话普及率低，日常交流使用普通话比例仅 44.79%，严重限制沟通效率。根源在于该群体多来自南疆和田、喀什、阿克苏等玉产区，当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较为薄弱，语言教育环境较差。加之来石佛镇从事玉石生意的维吾尔族居民年龄主要集中在 25—50 岁之间，其在中小学时普遍未接受系统规范的普通话教育，语言能力受限，约 90% 居民普通话水平在三级乙等及以下。多重因素致其与汉族等民族沟通困难，有效沟通难达成，影响其社会和经济融入。

在市场交易场景中，维吾尔族居民与汉族居民之间的交流互动模式呈现出明显的局限性。调研显示，在各类商业交易活动中，汉族商户与维吾尔族商户、消费者之间的交流频次较低，且沟通形式多以简单的口语对话为主。这种浅层化的交流方式，难以满足复杂商业活动中信息精准传递的需求，容易导致交易双方对商品信息、交易条款等关键内容的理解偏差，进而影响交易效率和交易质量。

深入分析维吾尔族居民的普通话能力结构发现，其听说能力与读写能力存在显著的发展不平衡现象。石镇当地维吾尔族居民中，男性群体的听说能力普遍较强，而女性群体在阅读与写作能力方面更具优势。这种性别差异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男性群体由于主要承担家庭经济收入职责，日常需频繁外出参与各类商业活动，在与不同民族群体的交流互动中，获得了大量的普通话口语实践机会，从而锻炼和提升了听说能力；与之相对，女性群体外出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相对较少，为提升自身语言能力以适应社会发展需求，更多地选择参加普通话培训班进行系统学习。

（二）政策执行系统性与实用性问题

当前针对维吾尔族居民的普通话培训政策，主要聚焦于考取普通话证书，缺乏长期系统性规划。这一政策导向直接反映在普通话培训班的运行与教学实践中，致使培训班在教材、教师、教学方法、教学表现与效果以及教学目的等多个关键环节存在显著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维吾尔族居民普通话能力的全面提升。

在教材方面，编写力量薄弱、内容脱离实际等问题突出。现用教材多为讲稿性质，缺乏充分的调研与论证，且更换频繁。以《在豫新疆少数民族群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班教材》为例，其内容简略，既无配套练习辅助巩固学习成果，也未配备多媒体资源丰富学习形式。最新教材内容更是与现实生活严重脱节，选取大量生活中极少使用的字词和超难诗句，学习者仅能机械记忆读音，却难以理解字词内涵与诗句深意，背离语言学习用于实际交流与应用的初衷，极大影响学习效果。这种教材质量问题，使得学习者无法通过系统学习有效提升普通话水平，难以满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交流和书面应用中的需求。

在教师资源层面，师资队伍的专业素养与稳定性均难以满足教学实际需求。普通话培训

教师多来源于当地中小学，非专业语文教师占比较高，且多数教师未接受过系统的双语教学培训。这导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难以根据维吾尔族学员的语言学习特点和需求，采用科学、有效的教学方法，教学方式单一陈旧。

从教学表现和效果来看，存在上课人数不稳定、男女学员学习差异显著等问题。每次上课总有学员缺席，教学秩序难以保障。同时，女学员数量远超男学员，且在课堂专注度和学习态度上，女生明显优于男生。这一现象背后，既与男女学员不同的社会分工和学习动机相关，也反映出教学过程未能充分调动全体学员学习积极性，未能针对不同性别学员特点制定差异化教学策略，导致教学效果参差不齐，难以实现整体提升学员普通话水平的目标。

石镇维吾尔族普通话培训班在教材、教师、教学方法、教学表现和效果以及教学目的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严重制约了培训质量和学员语言能力提升。若要切实改善维吾尔族居民普通话水平，需从完善政策规划入手，针对培训班现存问题，在教材编写、师资建设、教学方法创新、教学管理优化以及明确科学教学目的等方面进行系统性改革与完善。

对语言培训的看法	数量/份	占比/%
完全满意	18	36%
有待改进	26	52%
没有作用	2	4%
改不改都可以	4	8%

表 1 石镇维吾尔族人对语言培训的看法

（三）语言规划自觉性与长效性问题

在石镇维吾尔族语言规划上，政府与社区领域，当地尚未构建起系统且长期有效的语言政策规划体系，语言规划导向未能紧密贴合区域特色产业发展需求。作为玉石交易重镇，却缺乏专门针对玉石交易场景的语言教学内容，致使维吾尔族商户在与外地客商交流时，因专业术语不通、沟通不畅，错失交易机会，阻碍了玉石产业的进一步繁荣发展。同时，在维汉双语人才的引进与培养方面投入不足，数量有限的双语人才难以满足居民在学习、生活等多场景下的语言需求，使得居民在语言使用过程中面临诸多困境，诸如政策解读不清、学习疑难无处咨询等问题频发，严重制约了语言服务质量的提升与语言环境的优化。

从个人规划来看，石镇维吾尔族群众普遍缺乏明确的汉语学习规划，学习积极性不高。经济学中的稀缺理论为这一现象提供了深刻的解释视角。当地不少维吾尔族居民长期处于经济资源相对匮乏的状态，在玉石交易中获得收入后，受稀缺心态影响，将注意力高度聚焦于金钱与物质层面，更多地将收入投入到个人穿戴装饰等即时性消费上，以满足对物质稀缺的补偿心理，而对语言学习这种具有长期价值的自我提升投入甚少。这种没有长远学习语言规划的心理源于稀缺情境对个体认知与决策行为的深刻影响，稀缺状态占用了个体大量心理资源，使其在处理后续任务时表现不佳，难以顾及长远发展需求。同时，由于长期的经济压力和思维惯性，个体难以摆脱这种注意聚焦模式，进而导致维吾尔族群众乃至青少年在语言学习上缺乏主动性与持续性。这种稀缺心态还使得他们难以认识到语言能力提升对个人职业发展、社会融入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加剧了学历不高、学习动力不足的状况，形成恶性循环。

家庭层面的语言规划问题同样突出。石镇维吾尔族家庭普遍未制定明确的语言学习规划，家庭语言教育处于无序状态。受家长受教育程度有限及生活工作压力的双重制约，家长既缺乏辅导孩子学习汉语的能力，也无暇顾及孩子的学习与生活需求。Spolsky（2004）中明确指出，语言政策由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构成，家庭作为语言规划的微观主体，其语言实践与

管理策略深受语言意识形态、管理机制和实践活动三维框架的制约。

家庭语言意识	数量/份	占比/%
认为很有必要	47	94%
认为无影响	3	6%

表 2 家庭语言意识情况

从访谈数据来看，94%的家庭在语言意识形态层面已形成明确的普通话学习共识，这种意识的建构既源于社会结构性因素——如普通话在升学就业体系中的工具性价值，也与地域融入需求密切相关，家长普遍将普通话视为孩子社会流动的重要资本，这一认知本质上反映了语言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权力关系在家庭场域的投射。Spolsky（2004）指出，语言意识形态往往通过隐性的社会规范影响个体语言决策。在此情境下，家长对普通话重要性的认知已超越单纯的语言学习范畴，转化为对子女教育资本积累的战略规划。

家庭语言管理	数量/份	占比/%
有明确学习规划	15	30%
没有时间管理	23	46%
不知道如何管理	13	26%

表 3 家庭语言管理情况

在语言管理维度，家庭表现出显著的策略分化：30%的家庭受限于时间与精力成本，未能构建系统性的语言管理机制，这种资源约束可能源于父母职业压力或家庭分工模式，导致语言管理处于被动应对状态；46%的家庭面临管理能力不足的困境，折射出家庭语言规划知识的结构性缺失，即缺乏科学的语言教育理念与方法指导，反映出社会层面语言教育资源下沉的不足；而 26%的家庭则通过市场化手段实现主动管理，如借助线上课程的标准化体系与智能设备的技术赋能，将语言学习纳入制度化轨道。这一差异印证了斯波斯基关于语言管理需整合政策、市场与家庭资源的论断——当家庭自身管理能力有限时，外部资源的可及性成为突破管理困境的关键变量，而不同家庭对市场化资源的获取能力，又进一步加剧了语言规划效果的阶层分化。

家庭语言实践	数量/份	占比/%
实践活动单一	30	60%
注重全面发展	18	36%
无实践活动	2	4%

表 4 家庭语言实践情况

语言实践层面的数据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图景，60%的家庭仍停留在单一的听说训练模式，这种实践偏好可能与应试教育导向下对语言工具性的过度强调有关，将语言简化为交流工具而忽视其文化与思维建构功能；36%的家庭注重听说读写的协同发展，体现了对语言完整性的认知，有助于构建多维语言能力体系；而 4%的家庭完全缺失语言实践活动，暴露出语言规划在极端情况下的失效，可能涉及家庭语言意识的彻底缺位或教育功能的异化。上述数据表明，家庭语言实践的同质化与差异化并存，既受限于家长的语言教育观，也受制于社会语言环境的渗透强度——当家庭未能将语言实践嵌入日常互动场景时，即便具备明确的意识形态认知与管理意图，也难以实现语言规划的预期目标。

三、石镇语言政策服务与支持优化策略

语言规划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其实施效果直接影响多民族地区的社会融合与经济发展。石镇作为玉石交易重镇,其语言生态中存在的双语交流障碍、政策执行偏差、规划长效性不足等问题,亟需基于科学理论框架进行系统性优化。Ruiz(1984)提出了语言规划的三种不同原则:语言作为社会问题(language-as-problem),语言作为权利(language-as-right)以及语言作为资源(language-as-resource)。在前者,弱势族群为融入主流社会,往往都必须放弃自己的母语,完全学习主流社会的语言,避免弱势族群的语言成为社会问题的导因;在次者,语言被视为一种最基本的权利,弱势族群有权利保存并使用自己的母语,免于因语言而受歧视;在后者,各弱势族群的语言被视为是社会及国家的资源,因而得到重视、发展和培育。基于以上三个原则,并结合石镇语言生态中存在的双语交流障碍、政策执行偏差等问题,本部分从政府与社区规划、家庭语言规划、个人发展规划三个维度重构优化路径,形成“宏观政策引导—中观家庭协同—微观个体驱动”的立体化治理体系。

(一) 政府与社区规划: 构建系统性语言治理生态

政府与社区作为语言规划实施的核心主体,在破解石镇语言生态困境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系统性作用。针对石镇语言政策实施中暴露的培训体系碎片化、应试导向;语言服务不全;个人学习动力不足等问题,亟需从政府与社区治理层面构建系统性解决方案。政府和社区通过全链条的体系化建设,能突破现有政策执行瓶颈,实现从零散培训向系统治理的深层转变。

1. 优化普通话培训体系的全链条建设

针对石镇普通话培训政策执行中存在的系统性与适用性问题,需从多维视角构建科学优化策略,通过顶层设计、资源整合与机制创新实现培训体系的系统性升级。在长效规划层面,应突破当前只是应试导向的局限,建立涵盖基础语言能力、产业场景应用与综合文化素养的分阶段培养框架。初级阶段聚焦日常沟通与商业基础术语教学,帮助学员掌握核心语言工具;中级阶段强化玉石交易、法律文书等专业场景的语言应用能力;高级阶段则侧重跨民族文化传播与商务谈判素养培育,形成从语言技能到产业服务的能力递进链条。与此同时,需重塑“能力本位”的培训目标导向,将语言应用能力与职业发展需求深度结合,改变单纯以证书考取为核心的传统模式,构建“语言学习—产业实践—职业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

教学实施层面,需通过动态管理与方法创新提升培训实效。建立基于性别、职业需求与语言水平的差异化教学机制,针对男性商户侧重交易场景的口语实训,为女性学员设计文书写作专项课程,同时根据学员水平分层开展基础语音、词汇拓展与综合应用教学。创新情景模拟教学法,将玉石交易实景引入课堂,通过角色扮演、案例研讨等方式提升学员在真实场景中的语言应用能力;利用信息化技术开发互动学习工具,为学员提供实时语音评测与场景化训练支持,解决传统教学中实践机会不足的问题。教学管理上推行弹性学习机制,通过考勤激励、补课服务等方式保障学员参与度,针对男女学员学习特点制定差异化的学习任务与评价标准,缩小群体间的学习效果差距。

2. 技术赋能与语言服务网络构建

针对石镇维吾尔族居民语言学习中实践场景匮乏、实时反馈不足的问题,需构建“AI 技术 + 场景模拟”的智能学习生态。开发集成多维度功能的“石镇语言助手”APP,其核心模块包括:AI 语音评测系统可通过声学模型分析学员发音特征,针对“zh/ch/sh”等难点音素提供实时矫正建议;汉维实时翻译功能支持摄像头扫描商品标签自动译读,解决交易中术语理解障碍;动态玉石术语库收录行业高频词汇,配套3D建模展示“绺裂”“水头”等术语的玉石物理特征,辅以汉维双语例句解析。在培训班部署VR沉浸式对话系统,构建“外地客商洽谈”、“合同条款协商”等高度还原的交易场景,学员通过手势交互完成价格谈判、品质阐释等语言实践,系统根据对话流畅度、术语准确度生成能力评估报告,实现“虚拟训练—现实应用”的能力迁移。此外,开发“玉石商户学习看板”数据分析平台,整合学员学习时长、场景训练次数等行为数据,为教师提供个性化教学建议,解决传统教学中“一刀切”的效率瓶颈。

3. 利用“语言+X”提高维吾尔族居民语言学习积极性

推行“语言+产业技能”融合培训模式。针对玉石交易中专业术语沟通障碍问题,需打破传统普通话培训脱离产业需求的局限,可以开发《玉石交易专业汉语教程》。教材内容应涵盖玉石鉴定术语、商业谈判话术、合同文本解读等实用模块,配套多媒体资源与情景模拟练习,解决现有教材“生活字词堆砌”的脱离实际问题。

“语言+就业”。石镇在“天下玉源社区”设置“零工驿站”,该驿站及时发布本地、外地(本县以外)用工信息,配合乡镇劳保所、万企千站、劳务公司、企业等做好招工宣传推介服务,负责本社区公益岗开发、调配、管理考核工作,并配合乡镇(街道)做好适龄人员就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以及就业创业政策宣传、落实等。部分维吾尔族人随家属来到石镇后没有固定的工作,且部分商人在闭市后想寻求自由的零工副业,因此可以通过“语言+就业”的方式,倒逼维吾尔族人主动学习汉语,提高自身普通话水平和能力;负责人员根据学习的表现和效果,为学习积极者、学习效果好的人提供零工就业机会。

建立语言能力与就业创业的挂钩机制。针对维吾尔族居民语言学习动力不足问题,需将普通话水平纳入当地就业准入体系。建议联合工商部门规定,玉石市场商户申请经营许可证时,需提供普通话二级乙等以上证书,或参加市场管理方组织的语言能力测评。对达到标准的商户,给予市场摊位优先选择权或税费减免等政策激励;对未达标者,限期参加培训并补考。同时,在政府招聘、社区服务岗位选拔中,将普通话能力作为硬性条件,引导居民认识到语言能力对职业发展的重要性。针对稀缺心态导致的短视行为,可通过“语言能力助力收入提升”案例宣讲会,邀请双语商户分享因语言能力提升而拓展客户群体、提高交易溢价的成功经验,直观展示语言作为经济资源的转化价值,扭转即时消费优先的认知偏差。

二、家庭语言规划:重塑代际语言互动生态

家庭作为语言习得的初始场域与文化遗产的核心单元,在石镇语言生态构建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作用。当前家庭语言规划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子女汉语水平反超父母的代际语言倒置现象,影响个体语言能力的系统提升,也阻碍民族文化的代际传递。重塑家庭语言互动生态,需从意识培育入手,通过构建积极的家庭语言意识体系,破解当前教育缺位与代际断层的困境,使家庭成为连接国家通用语言学习与民族文化遗产的关键纽带。

1. 构建积极的家庭语言意识体系

针对石镇维吾尔族家庭中子女汉语水平反超父母的代际语言倒置现象,可以通过小手拉大手,让学生带动家长普通话的学习。由于家长需要参加学生所在学校举办的家长会,也要辅导孩子学习,这在一定程度上倒逼家长提高了学习普通话的意识。家长学习普通话的意识提高后,可以耳濡目染的教育孩子学习普通话,讲解普通话学习的好处,也可以在家庭内开展“家庭汉语小课堂”活动,由子女担任授课主体,每周设定玉石交易术语与生活用语学习模块,结合家庭经营的玉石货品进行实物教学。社区定期举办教育成果展,以情景剧形式展示家庭学习场景,对表现突出的家庭加以奖励。在家庭语言文化认同培育方面,可以编制《维吾尔族家庭语言文化手册》,收录生活、商业谚语的汉维对照解析与玉石交易故事。开展“家庭双语故事会”活动,要求父母用维吾尔语讲述玉石文化传统,子女同步进行汉语编译,优秀作品纳入社区“玉石文化有声图书馆”。此类活动可以解决家庭语言教育缺失问题,也可以通过代际协作形成文化传承的双向赋能。

2. 优化家庭语言管理策略

在家庭里,父母一般是语言规划和管理的人。父母的身份比较特殊,他们自己的语言教育经历和语言能力,会直接影响他们对语言的看法,还有家里语言管理策略的选择。很多少数民族家长都有过学双语的经历,有的是在学校系统学的,有的是在家里自然学会的,这种双重身份让他们既是家里语言教育资源的提供者,又是语言教育的管理者,还能整合语言资源,所以在这方面更有优势。他们制定家里的语言管理策略时,会从实际问题出发,结合自己学语言时遇到的困难,去辅导孩子学普通话,而且辅导的时候更有耐心。就像石镇,现在

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推广得越来越好,有些 21—40 岁的家长国家通用语说得很好,完全能在孩子上学前,给他们做国家通用语的启蒙教育。另外,少数民族家长受教育程度提高后,教育观念变了,对语言的重视程度也增加了,就更愿意主动参与到孩子的语言学习中,给学校的语言教育做补充。他们在家进行有效的语言管理,不仅能帮孩子提高国家通用语水平,还能让孩子在国家通用语、民族语言 and 外语之间找到平衡,解决青少年语言学习和语言政策之间存在的一些问题。

(三) 个人发展规划:激活语言学习内在动力

个体需突破稀缺心态的认知局限,建立语言能力提升会带动个人经济的发展,促使自己更好融入当地生活的价值认知。通过参与“双语商户经验分享会”,直观感受汉语能力对拓展客户群体、提升交易议价空间的实际作用,主动转变即时消费优先的资源分配观念。制定个性化的语言学习计划和语言学习清单,将学习目标与职业发展紧密绑定,如设定“半年内掌握玉石交易核心术语,实现与外地客商无障碍沟通”的阶段性目标,并通过可视化的目标成就记录表格持续追踪学习成效,形成有学习动机并采取实际的语言学习行动,个人进行反馈的自我激励循环。

在消费结构调整上,个体可建立“语言学习专项账户”,主动将收入的固定比例(如 10%)用于购买教材、参加培训等学习投资,改变“重物质消费、轻能力提升”的资源分配模式。时间管理方面,构建“交易场景即时学习,碎片时间强化训练”的全天候学习机制:在玉石交易中随身携带“词汇速记本”,实时记录汉族商户使用的行业术语及语境用法;利用摆摊间隙、通勤时间等碎片时段,通过手机 APP 完成 10—15 分钟的语音跟读或词汇打卡,将日常商业活动转化为语言实践场域。

秉持在交易中学习语言的实践理念,个体可采取观察、模仿、运用的三步学习法。可以观察汉族商户与客商的沟通模式,模仿其商品推介话术与谈判逻辑,在实际交易中有意识地应用所学表达,如尝试用汉语介绍玉石质地、解读鉴定证书等。针对自身语言短板制定差异化训练方案,听说能力薄弱者侧重参与市场实景对话练习,读写能力不足者则通过抄写交易单据、撰写经营日志等方式强化书面表达,形成找到学习困境和问题、通过各种资源解决问题并精准突破的学习路径,以此来提高维吾尔族人语言能力。

主动构建学习互助小组,与同行商户结成“语言学习搭子”,约定每日用汉语交流交易心得,相互纠正发音错误、分享学习资源。积极寻求专业支持,定期向培训班教师反馈学习难点,获取“一对一”的发音指导与语法解析;加入本地双语商户微信群,参与线上语言角活动,在跨民族交流中提升语言应用的流利度。这种“同伴互助、专业指导、社群互动”的多元社交学习模式,能有效解决个体学习中的孤独感与方法缺失问题。

建立语言能力成长档案,系统记录词汇量增长、场景应用进步等学习轨迹,通过纵向对比增强学习成就感。设定年度语言能力升级目标,如从“基础沟通”提升至“商业谈判”水平,并将目标分解为季度、月度小任务,确保学习进程的持续性。主动参与行业语言能力认证,将学习成果转化为职业发展优势,形成“能力提升—职业进阶—持续学习”的良性循环,实现从被动学习到主动发展的认知与行为转变。

通过上述自主性规划,个体可在无需外部强制的前提下,将语言学习融入日常生产生活,形成内生驱动的能力提升模式。这种基于自身需求与发展愿景的规划策略,既能破解稀缺心态下的学习动力不足问题,又能使语言能力真正成为推动职业发展与社会融入的核心资源,为多民族地区个体语言发展提供可操作的实践范式。

四、结语

本文以河南南阳石佛寺镇维吾尔族玉石聚居社区为案例,考察当地兼顾国家通用语言推广与民族语言保护的语政策落地现状,调研发现该地存在维汉双语沟通失衡、普通话培训

脱离产业实际、长效语言规划机制缺失、双语服务配套不足等多重问题,人口素质差异、家庭语言教育缺位、个体稀缺心态、产业资源约束、政策执行偏差等多重因素共同诱发语言生态困境;研究结合区域语言规划、言语社区理论与稀缺理论,从政府社区、家庭、个体三维度搭建分层治理方案,配套数字技术赋能、产教融合培训、跨部门协同、多元资金保障等实施路径,理论上丰富中原内地流动少数民族语言规划研究视角,实践上为当地优化语言服务、促进民族交融与产业发展提供可行方案,同时本文存在样本范围有限、量化数据不足等局限,后续可扩大调研范围、开展长期追踪并深化数字语言治理研究,该社区作为多民族语言政策实践典型样本,相关经验可为同类聚居区语言治理提供参照,助力统筹通用语言普及与民族语言传承,持续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参考文献

- [1] 汤琳琳. 乌审旗蒙古族家庭语言规划研究[D]. 宁夏大学, 2022.
- [2] 葛燕红. 言语社区理论视域中的羌族语言文字规划研究[D]. 南京大学, 2020.
- [3] 李宇明. 区域语言规划与区域发展[J].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 [4] 张以. 贵州少数民族家庭语言规划的质性研究——基于语言资本视角[J]. 遵义师范学院学报, 2023.
- [5] 李宇明. 语言规划学说略[J]. 辞书研究, 2022.
- [6] 苏日那. 蒙古贞地区蒙古族语言生活调查研究[D]. 内蒙古大学, 2020.
- [7] 肖垒, 杨磊.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城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的实践 基于石佛寺镇天下玉源社区的社会调查[J]. 实事求是, 2021.
- [8] 王远新. 维吾尔族在豫经商务工者语言生活及语言文化适应调查[J]. 民族教育研究, 2020.
- [9] 王莉, 连吉娥. 新疆维吾尔族聚居区的语言生活及其发展问题研究[J]. 新疆社会科学, 2015.
- [10] 戴曼纯. 语言政策与规划理论构建: 超越规划和管理的语言治理[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 [11] 刘晓宇. 关于中国语言障碍者语言政策的调查研究[D]. 东北师范大学, 2024.
- [12] 罗枢. 语言资本及其政策的经济效应研究[D]. 天津财经大学, 2020.
- [13] 李宇明. 试论外语教育能力建设[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25.
- [14] 李宇明, 李艳华. “中文+X”的类型及“工具语言”问题[J]. 世界汉语教学, 2024.
- [15] 李宇明. 区域语言规划与区域发展[J].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A Survey Research on Language Policy and Language Planning of Uyghur Inhabited Areas in Southwestern Henan

Liu Dan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City, Henan Province, 450000)

Abstract: Promoting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and script constitutes a crucial task for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among the Chinese people. Taking the mobile Uyghur settlement in Shifosi Town, Nanyang City, Henan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local language ecology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language policies through questionnaires, interviews and field observation. The study identifies structural dilemmas including unbalanced Uyghur-Han bilingual communication, exam-oriented and impractical Mandarin training, and the absence of a long-term mechanism for language planning. It further analyzes the root causes of these problems based on the speech community theory and scarcity theory. Guided by the three core concepts of language planning. This research enriches relevant cases on language planning for floating ethnic minorities in inland China and puts forward industry-specific language service schemes tailored to the jade industry.

Keywords: language policy; language planning;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floating Uyghur population; Shifosi Town